

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主教 (1922-1933)

外籍傳教士的革新典範



Arnulf Camps, O.F.M. 著
林瑞琪譯

教會的經歷告訴我們，傳教士與外國人這兩重身份差不多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從傳教學的角度看，傳教士就是負起任務到遠方去建立本地教會，讓當地人自行管理，並使教會完全與當地文化結合。在教會最初的千年中，這種傳教方針實踐起來並無特別之處，沒有引起人們的爭論。但傳教士的生活並不背離他本身的文化思想。這在十五世紀末期，尤為明顯。當時基督教會開始捲入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政治中。有時，外國傳教士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忽略了弄清楚拓展天國與助長西方列強利益之間的分別。他們會或多或少牽涉在列強的侵略內，甚至認同了這實況。他們不知道除此之外，再可以怎樣做

。但亦有些傳教士甚至認為可以懷著雙重效忠，一方面忠於他們所建立的地方教會；但另一方面又仍舊忠於他們所來自的國家。他們袒護自己的國家，多於真正的本地教會。可幸的是，仍常有不少傳教士反對這種態度。在印度，Nobili神父跳出葡萄牙人的社區，去體驗「真正的印度」。在拉丁美洲，自最初的白人到來之始，很多方濟各會會士一直努力建設一個不受西班牙控制的印第安人教會，他們更寫了一部印第安教會史。在中國，利瑪竇藉著學習中國文化及歷史，曾一度建立起出色的中國基督徒團體。傳教史告訴我們，解決傳教士與外來者角色上矛盾的方法多的是。

本文要特別介紹的是剛恆毅樞機主教。剛樞機 在一八七六年生於意大利北部，一八九九年晉鐸，他是命中注定要影響天主教會傳教觀的人物。一九二二年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他為宗座駐華代表，直至一九三三年為止。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他出任教廷傳信部部長，一九五三年他獲昇為樞機主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就在他的好友朗加尼樞機當選教宗的前夕，剛公與世長辭。剛恆毅樞機著作等身，並遺有五大卷回憶錄，論述其一生所遭逢的諸事（註一）。雖則他常謙稱只是教宗的一名卑微的僕人，但在現代傳教史上他卻實在是一名關鍵人物。他在中國服務的期間，更出色地處理了外籍傳教士在改變角色上的難題。

剛恆毅主教在中國所遇到最迫切的問題有很多，包括國籍司鐸與外籍司鐸之間的緊張關係；提拔國籍神父及祝聖國籍主教；在知識份子之中重建使徒工作，以及協助教會擺脫法國的保教權的政治影響。剛恆毅主教到中國前曾修讀近代政治及宗教史，兼且，他幸運地找到很多適當的諮詢人。他強調宗座代表的使命是牧民，因而在抵達北京之初，拒絕了由法國或意大利的外交官員引領晉見中國政府。

剛恆毅主教先在漢口逗留了一段時間，然後再到北京，住在教友為他安排的房子，而沒有留在外國使館區。他認為所謂的外國保護，正是中國教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與傳教士接觸時，他屢次指出他們是生活於過去之中，對中國正積極爭取民族復興一無反應。他很清楚地說明，傳教士借助外國勢力，

只會引來中國人民的忿怨。剛恆毅主教喜歡藉著個別的晤談來影響傳教士。我們知道他曾與長沙代牧區的 Kovac 神父長談，剛公深信他是有見地的人。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在漢口市，Kovac 神父向剛恆毅勾劃出何以中國人不願接受基督宗教的六大原因，包括：禮儀之爭的惡果、外國勢力干犯中國所造成的永久性創傷、基督徒之間的紛爭、中國人心態及宗教觀的影響等等。（註二）剛恆毅樞機聽取傳教士、國籍神父及教友的意見時，總是細心留意。一九二七年，他對我們說出他自己的看法：「這種種理由都未能說明何以天主教在中國未能成功。」他寫道：「其實目前最欠缺的是使徒方法。傳教士建立了很多傳教區，但卻沒有建立教會。他們混淆了兩者。在中國不是沒有國籍神職，而是沒有中國聖統制。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註三）剛恆毅樞機深信使徒的方法是建立教會，並盡快把教會的領導工作交由本地人士負責。他多次遊歷中國各地，會見宗座代牧及外籍神職（剛恆毅主教來華時尚未有中國籍教牧），並強調引用教宗本篤十四世的「夫至大」通諭及比約十一世的「教會事件」通諭，以建立中國聖統。一九二五年他感覺到，「把傳教區視作宗教殖民地，隸屬於某一機構，已導致傳教士產生一種異常的心態，這無異是『地區封建主義』。（註四）」宗座代牧及他們所屬的修會組織，都不願意從自己的範圍劃分出部份土地，以開闢新的教區。兼且，他們視國籍神職為下屬的角色。中國神職大部份不屬於任何修會，外籍修會神父只視他們為副手。更甚的

是，外國修會不允許其他修會涉足他們的傳教區。剛恆毅主教稱這為「地盤割據主義」。(註五)

剛恆毅主教的任務就是要解救這困境。一九二三年，他決定向羅馬建議成立一、兩個國籍教區，由中國神職人員管理。他希望這計劃能在一九二四年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舉行前實現。剛恆毅主教停居在漢口，當地已委托給了方濟各會牧守。他與他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他嘗試說服田瑞玉代牧，從他的教區轄地內，劃出一部份來建立國籍教區。在剛恆毅樞機眼中，田代牧是一個很好的主教，只是對他的建議不放心。田代牧知道國籍神父沒有法律地位，又不獲政府當局尊重。但假如教廷決定這樣做，他也願意服從。剛恆毅主教採取了具體行動，希冀以實例產生法則，換言之，國籍教區首長誕生這一事實，會改變政府的態度。於是，在一九二三年末，蒲圻升格為監牧區，由方濟各會會士成和德神父任監牧。一九二四年四月，蠡縣成為第二個國籍監牧區。兩位國籍監牧均有參與一九二四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一九二六年，剛恆毅主教再跨進一大步，由北京代牧區劃出一部份地方成立宣化代牧區。事情進展神速，王老松樞機主教在羅馬提議，新委任的中國籍代牧應前往羅馬，由教宗親自祝聖。剛恆毅主教全力和議，並建議兩位監牧及另外三位新代牧亦應同行。教宗庇護十一世於是邀請了這六位國籍教區首長到羅馬，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親自祝聖他們為主教。(註六)剛恆毅主教一直沿途相伴，並因中國教務終於

得到突破而感到高興。

剛恆毅主教的下一步行動是建立中國政府與教廷之間的聯繫。這首先以「公教進行會」開始，鼓勵教友參與國家復興運動。一九二六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批准了這項運動。一九二七年，中國政府批准天主教開辦一所大學，校園座落於北京市。很多外籍教牧都顧慮這事可能導致法國保教權結束，助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最終會擠掉以外國勢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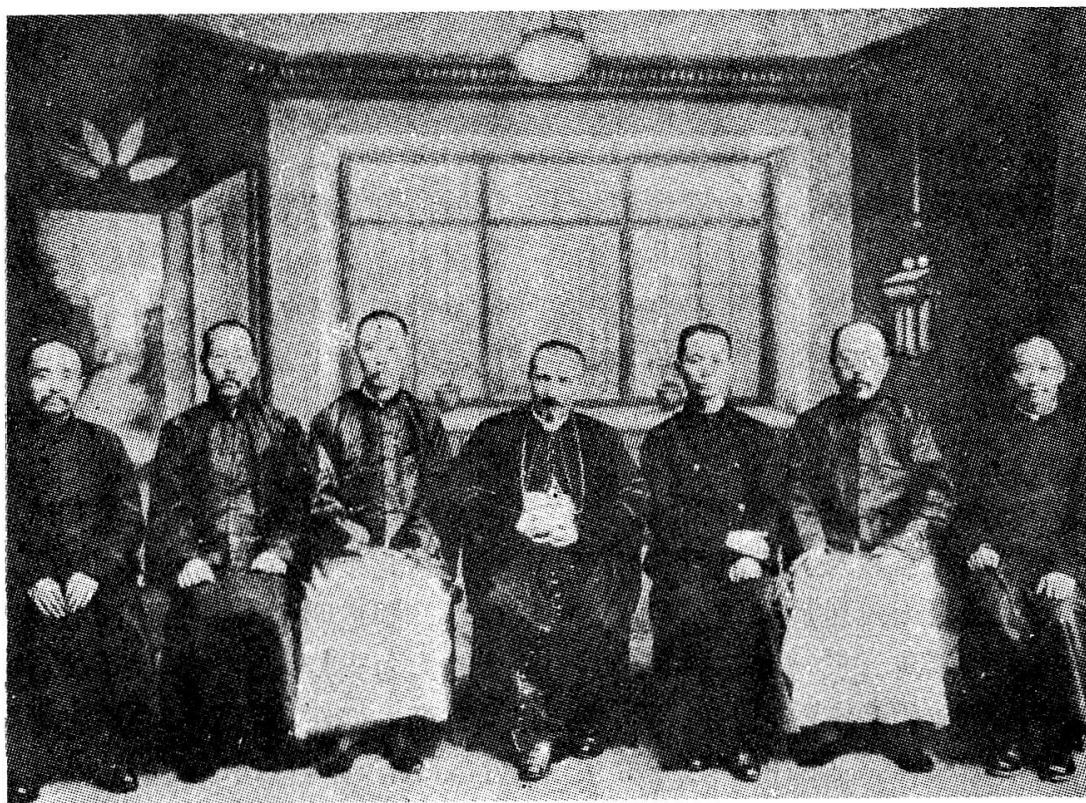
後盾的外籍傳教士。(註七)但剛恆毅主教願意冒這個險，他認為中國教會無論如何應是屬於中國人的。

剛恆毅主教面對很多場戰鬥。他的態度總是溫謐而堅定的。他對北京輔理傳教富成功(Mgr. J. Fabregue)的態度可以引為一例。富主教在一九二八年招請道明會神父及修女到北京，為的是準備開辦另一間天主教大學，即道明大學。他獲得法國政府在金錢上的大力支持，還贈予他榮譽。在剛恆毅主教看來，這件事足以令中國人懷疑傳教士被外國政府利用以獲取利益。剛恆毅主教不接

受這象徵著法國保教權的舉動，認為這是「舊時代傳教士」的作為。不久，這所大學問題叢生，有人控訴外籍傳教士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正在進行文化侵略。先前成立的輔仁大學的學生，公開反對這所新開辦的學府，以示天主教為精神上的事務，與外國勢力無關。最後，輔仁大學依舊保持為唯一的天主教大學，道明大學則停了不再辦下去。剛恆毅主教堅決反對富主教及他的支持者，不過，他仍設法通過溫和有禮的交談去解決問題。他支持新中國的國家精神，認為本身是一件好事，對有心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人給予鼓勵。

剛恆毅主教在中國的行動及精神，最能反映出外籍傳教士在角色上的轉變。最令我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行動全仗初期教會宗

徒的方法。他不斷引據初期教會，堪稱為二十世紀傳教的改革家。他與當時的中國人民及政府在牧民需要上的交往，正好配合他的使命：協助中國人重新得到自主及重建國家尊嚴。另一方面，剛恆毅主教並不贊成獨行獨斷。他深知在中國亦有其他的運動在爭取相同的目標。任何人讀了他的著作之後，都會有一番「溫故知新」感受。無疑很多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扮演了錯誤的角色，留下很多惡感。但當我們看看剛恆毅主教及與他同代的教宗所致力推行的宗徒原則，我們也許不再是感到苦楚而是感到可惜。因此，中國進入歷史上的新時代，應有一個新的開始。正如剛恆毅主教所熟知的，所謂「革新」，就是要返本歸源，從而溢流出新的自由，開創出新的關係。（附註請參閱頁 45）



剛恆毅主教與首批六位國籍主教合攝